

导 言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而辉煌的文化传统。水利与交通是社会基础文明的一部分，由于联系着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形制，我国水利与交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在特定的自然地理背景下的水利与交通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首先是水和土。水土是社会和自然的根本，于是古人认为“有了水土资源，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所平”（《韩诗外传》）。而由于所处地理纬度、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水土资源的分布很不均衡，需要借助于人为的努力，以改善水资源和水环境，于是产生了水利事业。例如，由于东亚季风的控制，我国降雨主要在夏秋季节，汛期的 6 至 9 月，降雨量往往占全年的 60—80%。又由于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条件，河流大多自西向东流，大江大河既造福人民，平原地区往往又遭受洪水的威胁。于是就产生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国家产生之后，组织大规模的改造水环境的工作往往成为政府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由于水土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降水往往与作物生长期不相适应，在农业社会中为了社会的发展，灌溉和排水等农田水利事业也与中

华古文明相伴而生。也由于降水量的不同和地形的差异，形成了众多的农田水利工程形式。干旱地区，例如新疆的吐鲁番盆地主要依靠坎儿井引取地下水；半干旱的宁夏、内蒙古地区，多为引河水灌溉的渠系工程，作物多为旱作；半湿润的东北和华北平原盛行陂塘蓄水和渠系工程，也以旱作为主，其中华北平原有大面积盐碱地，还要注意排水。而在湿润地区，更有蓄水陂塘、引水渠系、圩田和垸田、滨海拒咸蓄淡工程等多种工程形式。

交通的进步受到地形的限制，于是突破这种限制以促进人们的交往，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便成了交通发展的重要内容。内河航运与河流的关系最为密切，河流密布的南方航运条件优于北方，大江大河的航行由于河流的自然分布而沿东西向展开。周襄王五年(前 647 年)，晋国发生大饥荒，秦国派船队载粟支援，水上舳舻相衔，自渭水入黄河，再溯汾水至晋国，是黄河干流和各支流间的大规模水上运输的范例。特别是在古代，由于水运的载重能力大，因而运输，尤其是货物运输更以水运为主。而完全依靠天然河流的水上交通却受河流的东西分布的大形势的局限，水系之间多互不连贯，于是产生了开凿人工运渠的需要。南北向人工运河克服了东西向天然河流之间的障碍，使交通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春秋时期的邗沟已开始沟通长江和淮河，至隋代通济渠和永济渠的出现，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水路运输网。陆路交通自然普遍建设于广袤的平原和沿河谷地带。而且历代的道路交通，大多以首都为全国交通网的中心，向四方辐射。

二、水利、交通与社会的发展

水利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是显著的。一方面，水利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直接作用于社会，促进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社会

制度的变革又反过来影响水利的发展。水利促进社会变革的事例很多，大禹治水的直接后果是使大禹具有了极高的威望与权力。在当时生产力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权力的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建立了政权机构，划分了行政区划。禹的儿子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治水活动在这次社会变革中起着促进的作用。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为积蓄作战物资，秦国先后兴建了都江堰和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因而使国力大盛，为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封建制度兴起的战国之际，大型水利工程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类似都江堰的大型灌溉工程，类似鸿沟和灵渠的沟通相关流域的运河工程，类似黄河系统堤防的防洪工程，充分体现了社会对水利的要求和对水利建设的推动。然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失去活力，小农经济限制了经济的继续增长，明清时期水利建设大体呈现出维持的态势。

正因为水利与社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而且水利工程一般规模较大，涉及不同行政区，更需要政府部门统一协调和管理，而水利管理的有效性，甚至成为农业社会的兴盛与衰败的主要原因。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就曾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①他在这里所说的亚洲，具体指的是古代的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国，也包括非洲的埃及。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水利法规和行政管理的完善，是中国水利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水利的突出优点。而中亚地区许多古文明发祥地，日后之所以衰败，水利管理的松弛是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5页。

是原因之一？这个牵涉环境演变的问题，至今仍是许多中外学者感兴趣的课题。

交通在巩固政治统一，安定社会民生方面有突出的作用。战国末年，百姓早已厌倦战乱，渴望明君稳定社会，带领百姓营建安定的生活。因此，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清理割据的壁垒是当务之急。秦始皇登基的当年（前 221 年）就下令统一全国车制，实行“车同轨”。第二年（前 220 年）又部署修筑全国道路交通网。当时国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中称作驰道的交通干线东通齐鲁、北出燕赵、东南抵达吴越、西及陇西、南下江陵。道路也有统一尺度，西汉人记载“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汉书·贾让传》）。此外还有通往岭南的新道和穿行巴蜀的栈道。形成了一个“四方辐辏，并至而会”的交通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分别联系着当时全国的主要大城市。以驰道为骨干的全国交通网，不仅起到了加强秦王朝统治的作用，也为后代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在我国的对外交通中，向西以丝绸之路最为著名。丝绸之路自西汉开辟以来，与西域各国使者、商旅频繁往来，大宗中国丝绸、铁器等通过这一横贯亚洲的交通大道，源源不断运往中亚和西亚，并转至西欧。西方的玻璃和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特产以及印度的佛教、音乐、舞蹈等也传入我国。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东方最繁华的城市长安，通过丝路与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联系起来，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古国相互沟通，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后，造纸技术等重大发明的西传，更推进了西方的文明与进步。

中国对外交通还有海运一路。海运在夏商时期已经开始，秦汉时期已开辟到朝鲜和日本的海路。特别是在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微，海上的对外交往更为重要。至宋元时期，海上交通有重大发展，中国远洋船队往来于印度、阿拉伯，远至非洲东海岸。这一时期，

与印度等国的海上交通以中国船队为主。自汉代迄明清，在航海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世界航海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南海航线中，广州、泉州已成为最大海港。通过海上交通，促进了中外交流，许多外国的特产和先进生产技术传入中国，尤其是占城稻与棉花和棉织技术的传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衣食结构，影响重大而深远。而中国的瓷器和制瓷技术、造船与航海技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西传，也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在文化传播方面，通过海上交通，加速中国儒学和印度佛教的相互交流。日后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对于中西文化科学交流有重要的意义。

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业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明永乐年间郑和七次远航亚洲和非洲，遍访三十余国，更大规模地展示了中国远洋航行的能力，以及所掌握的领先世界水平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郑和远航，船队规模宏大，少则数十艘，多则上百艘船只，最大的船长 44 丈，宽 18 丈，可容纳 1000 人之多。首次航行是在永乐三年（1407 年）此后一世纪，1492 年哥伦布才开始了发现美洲的著名航行。当时哥伦布率领的船队只有三艘帆船和百十个人的规模，难以与郑和远航相比。更截然不同是远航所追寻的目标。中国船队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特产的丝绸、瓷器相馈赠，并换取各地特产，不带有任何侵略、掠夺的目的，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而哥伦布远航之初，就和西班牙国王商定，由西班牙国王资助他三艘帆船和大部分航行费用，授以海军大将头衔，并预封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土地上的一切财富，扣除费用外，十分之九归西班牙国王，十分之一归哥伦布，一开始就明确了远航的掠夺和侵略性质。新航路的开辟引导出随之而来的殖民掠夺，同时又是欧洲近代文明发展的杠杆。联系到中华民族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而修筑的万里长城，为抗御倭寇而实行的海禁政策，可见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基础所养育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的内向性的中华古文明不是侵略性的。

三、水利与交通的发展直接影响经济的进步

水利和交通处于基础产业的地位，它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进步。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件大事是大禹治水。其产生的背景是社会已进入原始公社末期，主要经济形式已由狩猎、畜牧向农耕过渡，农业已进入锄耕阶段。因此，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必然由丘陵向平原转移。而在黄河等大河下游平原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洪水的威胁，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各氏族公社团结治水、改造自然的可歌可泣的史诗。大禹治水的成功告诉人们，社会经济要发展，必须取得水利的保障，而大禹治水作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之所以如此著称和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说明了它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春秋时期齐国大政治家管仲（？——前 645 年）对于治国必先治理水旱灾害有精辟的论述：“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度地》）而五害之中，又以水、旱灾害居于第一和第二位。可见水、旱灾害自古以来就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威胁最大的灾种。减轻水、旱灾害有许多途径，例如储粮备荒。政府往往要准备至少三年的储备粮，所以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此之谓国备。”（《墨子·閒诂·七患》）当然，抗御水、旱灾害的积极办法首先是兴修水利。所以管子说：“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管子·度地》）。也就是说，要在中央政府内设置专管水利的部门，让熟悉水利技术的人来管理。可见，在农业是基本经济部门的古代，水利是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必要条件。时至近日，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更受到暴雨、洪水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制约，水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

水利发展受社会制度的推动和制约也是显而易见的。由奴隶社

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变革中，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春秋战国期间的水利建设和水利科学技术水平都获得空前的发展。而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后，进一步提供了发展水利的条件，特别是许多大型工程的建设，成为有力的证明。即使在分裂时期，地方割据政权为了自身的稳定和发展，都不能对关系百姓生活和国力增长的水利事业掉以轻心。三国时期，魏、蜀、吴各在自己领地上发展水利，以为兼并战争的资本。唐末五代的分裂时期，吴越国盘踞太湖流域一带；“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盖当时方欲富境御敌，必以是为先务”^①，进一步奠定了太湖地区农业和地区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社会经济的进步，交通也是必要的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经济获长足进步，长江下游已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加上早期开发的黄河流域，国力增加一倍以上，自此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隋唐运河的兴建有着重要的作用。运河的开通带动了东南经济的开发，东南财富由此向政治中心的西北输送。黄河与长江两大经济区的沟通，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联系的加强，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运河成为社会统一、文化交流、经济沟通的命脉所在。至元代京杭运河开通，我国的交通轴线已由周秦汉魏年间的长安—洛阳东西轴线，转变至唐宋的西北—东南的轴线，再转变为元明清的南北轴线。这是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变迁和发展的要求。

然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一家一户的农民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农民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生产基本是为了自身的消费，因此，商品经济相对

^①《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是不够发达的。这也成为交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至近代文明兴起，现代科技推动了水利与交通的进步。大坝大库的兴建和铁路、汽车、轮船、飞机的出现，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四、水利与交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体现和影响

水利与交通是密切联系着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两大经济门类，因此，人们对水利与交通的体验，必将直接渗透到宗教、哲学、伦理、史学、科学、文学等领域。

（一）反映在水利与交通中的宗教色彩

人们在治水害兴水利的斗争中深刻感知到自然力的强大。初时，在强大的变化莫测的自然力面前，人的力量和智慧显得十分渺小，于是衍生出对某种超自然的神力的崇拜。从远古的自然崇拜、商周时期的天帝崇拜，以至后来的佛教和道教，都对自然界中的水和水的变化有所反映。

洪水是对人们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它的发生有季节的规律性，也有偶然性，可怕而又带有若干神秘色彩。殷商时代问卜中常有水灾内容。如甲骨文中有“丁巳卜 其雩于河？牢，沉郟？”（《殷虚书契后编》）郟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女奴隶，沉郟是将女奴投入河中的祭祀，为的是预测吉凶，祈求河神保佑。对自然力的崇拜，是早期的宗教行为。这种宗教行为一直延续数千年。在黄河等大江大河上，还有铁牛、水兽镇压水神兴风作浪的做法。例如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河南巡抚于谦为镇伏连年黄河决口泛滥，在开封建“回龙庙”，供奉上府至尊和金龙四大王等河神，并铁铸一尊独角犀牛，称作镇河铁牛。其上铸铭文曰：“百炼玄金，溶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御堤防，波涛永息……”为什么铁犀能御水呢？康熙时有人解释说：“铁犀有二义焉：

铁者金也 为水之母。子不敢与母斗 故蛟龙咸畏之 犴即牛也 属坤为土 性能克水。^①从五行生克演化而来。都江堰也曾在明嘉靖年间铸有铁牛鱼嘴。铁牛位于鱼嘴最前端，重三十余吨。所以铸成牛形，是因为相传李冰修都江堰时曾变化作牛形，与江神斗。铸铁牛，为的是藉助神化了的李冰以保平安。类似的镇水兽在各大江河多有建造，寄托着人们的希望。而祭祀河神的回龙观、龙王庙、大王庙、河神庙更较普遍。这些都是出于自然崇拜和对大自然恐惧的心理而抽象出来的神。

还有由人演化而来的神。李冰兴建都江堰功莫大焉。“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 立其祠”(《北堂书钞》卷七四引《风俗通》)秦代为褒扬其功德，为之立祠纪念。而当抗御水灾遭受挫折的时候，人们希望藉助先圣的形象和威名以抵御灾害。人们祈福的愿望，为宗教所利用，并逐渐掺入神话的成分。道教传说李冰治水功成，至后城山遇羽衣仙人来迎 遂仙去。于是五代时封李冰为大安王 又封圣灵感王 宋代封广济王 并演化出其子为二郎神的说法 遂父子合祀 称“二王庙”。道教对中国古代民俗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福建莆田的木兰陂修建时几次被潮水冲毁 历尽艰险。建成后 自宋至今惠济一方 人们对木兰陂的创始人和在建堰时牺牲的钱四娘感激追念不已，遂立祠纪念。宋元丰年间在堰址修庙两座，前庙祀钱四娘，称员惠庙；后庙祭祀继钱四娘完成堰工的李宏、冯智日、林从世等人 称义庙。两庙香火极盛 至今不衰。

交通方面的宗教现象也较普遍，妈祖信仰是最显著的例子。妈祖原名林默，是福建莆田调州屿上的女孩，生于建隆元年（960年），只活了二十八岁。据说此女缄口不语却十分聪慧，善操医术，且能预卜吉凶，并多次冒风浪下海救人。她死后人们为纪念其功德，祈求其继

续保佑，为之立祀。这种信仰很快传遍东南沿海，历代帝王也加以提倡，曾数十次加以褒封。元代因妈祖“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元史·祭祀志五》），列入国家祭典。至今仅台湾就有妈祖庙 411 座之多。妈祖是保护海运的女神，佛教认为她是观世音的化身，而道教则加封其为碧霞元君。儒、道、佛交融的现象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二）治水实践在哲学上的反映

中国古代哲学充满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在水利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例如，古人对水旱灾害的控制能力较低，把水旱灾害看作人力无法抗拒的天的意志，不得不企求上苍的保佑。求雨的仪式叫做“雩”。雩礼还被作为国家的祭典在《周礼》中加以规定。战国时诸子蜂起，学术思想的解放推动了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人们对水旱灾害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荀子（前 313—前 238 年）就曾一针见血地揭穿雩礼的虚伪，直截了当地指出：“雩何也？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荀子·天论》）。既然求雨无益，为什么还要行此大礼呢？他认为，那是政治家为粉饰自己管理的缺陷，杜撰出一个超自然的神，以欺骗百姓并进而归纳出著名的唯物主义命题：“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他对人类战胜自然的赞颂是难能可贵的。晋代的傅玄（217—278 年）进一步揭示了水利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傅玄重在人事的观点，是水利改造自然的实践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

对天灾的唯心主义认识到西汉董仲舒（前 179—前 104 年）又有新的发展。他认为，自然界是有意识有情感的，而且与世上人事相通。灾异本身是国家行政失当所造成，是上天对人间君主的谴告。即

所谓“天人感应”论。因此，只要人间修明政治，灾变自除。于是在西汉治河中就曾出现：“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汉书·沟洫志》）的论调，并因而导致多年不堵河流决口，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发生。此外，对先圣另有一种迷信，例如把大禹治水因地因时制宜而采用的疏导方法，多视为经典和不可逾越的教条，提出“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汉书·沟洫志》）的治河方针。战国时慎子则对此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他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决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慎子》）痛快淋漓地指出遵从水的自然规律和社会需求是治水的唯一法则。时代进步了，治水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不必拘泥于先圣当年合理而现在过时的治水方法。这也反映出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古人的认识也有相当科学和精辟的见解。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指利用自然规律改变自然状况，使其更适合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要求，他的热情洋溢信心十足的这段议论是对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力的赞颂。然而，人是从属于自然的，是和自然一体的，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适应自然，与自然发展相协调则是片面的。西汉末年贾让在阐述他的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条方针时，强调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需注意顺应自然的观点。他认为，西汉黄河之所以屡屡决溢，除黄河自然淤积、洪水严重之外，人们开发利用和治理失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年人们为利用黄河肥美的滩地，而在其上垦殖和居住，以至圈地越圈越多，逐步压迫河槽，使得黄河河槽窄小，弯曲再三，洪水来临时，既无足够容蓄洪水的河槽，泄洪能力也大为削弱。于是他说，表面上黄河泛滥，是洪水淹没民居了，其实是人们侵占了原本应让给河流的空间。人们不合理的开发导致的灾害，实在是“沉溺自其宜也”（《汉书·沟洫志》）。由此他认为“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今天治河

则应‘遵古圣之法 定山川之位 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妖 音干’”(《汉书·沟洫志》)。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中国哲学家认为，肯定天人合一才达到人的自觉，这可谓高一级的自觉”^①。古代哲学思想精华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当产生于对客观存在的外在自然的观察 所谓‘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对于水循环，《吕氏春秋·圜道》说：“云气西行 云云然，冬夏不辍 水泉东流 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 小为大 重为轻 圜道也。”《论语·阳货》也说：“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则将其归纳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阐明了宇宙事物运动不已、无穷往复的过程和规律。都是极精辟的见解。

(三) 水利与交通在史学与文学上的反映

水利与交通在史学和文学上也有较多的反映。例如在史学方面，在二十五史中就有《史记》、《汉书》等七部正史设有《河渠志》(或《沟洫志》)更多的正史都有《五行志》其中收录大量水旱灾害资料。正史中的‘本纪’、‘列传’等部分也有许多水利和交通资料。除史书、地方志有数量众多的水利与交通内容外，还有多达数百部的专门技术书籍流传了下来。水利与交通的历史文献之多，可以和天文、数学、农学、医学相媲美。此外 由于水是生命的摇篮 水与人类文化有着最早的渊源，又由于自然界中的江河湖海无不给人以视觉上的愉悦和引发多种复杂的情感 以及水利与交通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常常成为文学表现的题材。无论是诗歌、散文、戏剧、绘画 都有着大量水利与交通内容的反映。总之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与交通在文化形态的上层建筑中占有一席之地 并影响着文化的发展。

^①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一章 治河与防洪事业

俗话说“洪水猛兽”、“水火无情”反映了人们对大水、大火等重大自然灾害的恐惧和忧虑。水灾是对人类的威胁最大、损害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管仲便说过，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先治理好五种自然灾害，在五种自然灾害中“水最为大”。事实上，始终伴随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是一部防洪治河的历史。

大禹的治水活动掀起了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两千年前汉武帝主持的黄河瓠子堵口，使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事业得以确立。中华民族在与洪水作斗争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治河思想，创造了气势宏大的堤防工程。纵观历史，治河防洪与社会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我国系统的防洪工程首先起源于战国时期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流经中原腹地，是国家漕运畅通的关键，因此治黄是我国治河防洪的主要工作。唐代以后经济重心南移，长江及珠江的防洪事业进入了发展时期。

第一节 治水神话与治河防洪工程起源

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圣经》记载的挪亚方

舟，讲述了洪水毁灭家园，幸存者靠一叶方舟逃出，以后民族得以复生，家园得以重建的犹太人的早期历史。在世界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印度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伊拉克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都有这类神话传说。华夏民族的早期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也很丰富，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生动地折射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与滔天洪水的搏斗中征服洪水的历程。

一、女娲和鲧治水的的神话——从补天到堙堵洪水

女娲是流传久远的古老神话中的女神 她是创造之神(造人)婚配之神(婚配)救世之神(补天)其中女娲补天的神话演绎了母系氏族社会先民在大洪水的袭击下求生存的情景。

最早记载女娲神话的是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往古之时 四极废 九州裂 天不兼覆 地不周载 火熾炎而不灭 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³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 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 四极正 淫水涸 冀州平，狡虫死 颡民生。”(《淮南子·览冥训》)这则神话讲述了远古时期，大雨不断 引起特大洪水 人们家园无存 禽兽相攻。女娲挺身而出 炼五色石补好了淫雨不止的苍穹，又断鳌足支撑天的四方，杀死地上兴风作浪的蛟龙，使百姓重归安宁。女娲补天的神话表现出先民企求神的帮助，中止淫雨、消弭洪水的愿望。

鲧的神话发生在传说的唐尧时期。“当尧之时 水逆行 泛滥于中国 蛇龙居之 民无所定 下者为巢 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在大洪水围困之时，天帝之孙鲧来到人间。鲧受尧之命治水，他从天帝那里偷来了“息壤”这是一块可以无限滋生的土 只要投下一小块，就会长成山岭。鲧治水九年，用息壤堙堵洪水。可是洪水滔天，随着山岭的增加而上升，连高山也淹没了，大地仍然是一片汪洋。鲧

治水的传说反映出先民们开始依靠护村堤防洪的史实。鲧治水没有成功。窃息壤的事为天帝所知，天帝大怒之下派遣兽身人面的火神祝融到人间，将鲧杀死于羽山。鲧死后三年而尸体不腐，天帝再遣祝融下凡，用刀剖开鲧的肚子，从鲧的肚子里跳出了禹。禹成人后，被众人推举做了首领。由此社会的发展从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而人类与洪水灾害的搏斗由“息壤”堙堵洪水而转为大禹的疏导洪水。

二、大禹治水——掀开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

黄河流域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亿万年来黄河挟西北高原的肥沃土壤东流，造就了黄、淮、海大平原。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由渔猎而农业，社会演进，文明肇启。大禹治水发生在黄河流域，其时正是国家开始酝酿的奴隶社会早期。

最早以文字记载大禹治水传说的是《尚书》，先秦诸子文献补入新的内容，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各种生动的记载。

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是大禹治水活动的主要区域。相传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时，黄河流域出现了持续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鲧治水无功，其子禹继承父业。大禹被众人推举为部族首领，在伯益和后稷的辅佐下开始治水。禹治河采取疏导为主的办法，沟通黄河下游流路，他“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至于大，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这条黄河下游流路，史称“禹河”或“大禹故道”。

传说中的禹治水足迹遍及江、河、淮、海四大流域。《墨子·兼爱》记禹西治黄河、渭水，北治汾水、滹沱，东开渠道水入海，南治江、淮五湖。《孟子·滕文公》记禹疏九河，江、淮、河、汉等水系形成。关于大禹治水的事迹记载就更为丰富：禹治水历经 13 年，婚后第四天

人类由游牧社会进入农耕社会，由于定居生活方式和灌溉的需求，首先选择水源丰沛的地区，随之也带来了对人类社会生存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洪水灾害。大禹治水的传说包含了漫长的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与洪水斗争的历史史实，而大禹治水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加速了社会划时代的变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的一页。禹治水的成功使先民有了安居的土地，于是才有农业的发展，才产生了古代文明所拥有的一切，中国文明之门打开了。

三、禹治水的深远影响——防洪治河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在水利工程技术史上，大禹治水是大规模水利工程的肇始。远古文明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与洪水的搏斗经历了三个阶段：对洪水及其灾害恐惧（祈望中止降雨（女娲的炼石补天）以减少洪水，企图借助地势，堙堵洪水（鲧的息壤挡水）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与洪水搏斗的历程（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开辟了依靠相当规模工程手段防洪的新时期。

禹治水所采用的疏导洪水，使其顺流入海或回归干流。相传主要方法是：“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尚书·益稷》）。距是为到，即疏通骨干河道，导引漫溢洪水和渍水入海或回归河道。禹以疏为主的治河办法，已经部分地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况。经过人工疏浚后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行洪速度加快。大禹治水活动已经运用到了测量和数学计算，“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这些基本的技术手段使大禹的治河得以成功。

大禹治水后，黄河直到周定王五年（前 602 年）才出现了大改道，在长达一千多年间，黄河在大陆泽以下一直多流入海。这期间文献再